

复旦日本研究丛书

近代日本文化人与上海

(1923—1946)

徐静波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014014099

K833.135.4
01

复旦日本研究丛书

近代日本文化人与上海

(1923—1946)

徐静波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K833.135.4
01



北航

C1701051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近代日本文化人与上海:1923~1946/徐静波著.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

(复旦日本研究丛书)

ISBN 978-7-208-11924-6

I. ①近… II. ①徐… III. ①文化-名人-人物研究-日本-1923~1946 ②文化史-研究-上海市-1923~1946 IV. ①K833.135.4 ②K29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73212 号

责任编辑 赵蔚华

装帧设计 张志全

·复旦日本研究丛书·

近代日本文化人与上海(1923—1946)

徐静波 著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20×1000 1/16 印张 29.5 插页 2 字数 376,000

2013 年 11 月第 1 版 2013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08-11924-6/K·2135

定价 58.00 元

前 记

本文不算序言,甚至也不是像样的前言,只是觉得有些后记部分的内容需要放到前面来说明,乃曰前记。

与本书主题相关的内容,我在二十年前就萌发了兴趣,那时在早稻田大学访学一年,留意过有关文献。但第一那时我没有相应的学术准备,第二甚至也没有明确的研究计划,结果蹉跎岁月,回国后,只是勉强发表了一篇《本世纪二十年代中日文学家间的交往——以上海为中心》,当然十分的稚嫩。以后是继续蹉跎岁月。20世纪90年代末期,企图重拾这一主题,1998年春天,去长野大学教书,差不多收齐了大部分村松梢风的文字,在那里的一年间,编选了村松梢风和谷崎润一郎与中国有关的文字,翻译了两本集子,原计划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不意因诸种原因,手写的译稿至今依然束之高阁。2000年秋天去爱媛大学教书三个月,利用闲暇继续收集有关文献,回国后发表了一篇《作家村松梢风的中国游历和中国认识的研究》。然而深感愧疚的是,这一主题的研究竟然未能持续下去,虽曰有各种主客观的原因,但我自己缺乏恒心和毅力,或者说学术定力是最根本的因素。其间中途出轨,为云南人民出版社写了一本《东风从西边吹来——中华文化在日本》,又心有旁骛,花了几年时间写了一本三十几万字的《日本饮食文化:历史与现实》,出版之后,才在2009年正式沉下心来回到原来的研究主题。2010年在神户大学教书的一年大概是我于日本期间在学术上最有收获的一年,主要是在文献收集方面。在神户期间已陆续撰写了几篇相关论文,回到上海后笔耕不辍,伏案五年之后,终于有了这本书稿的杀青。

我出生在上海的虹口,并在吴淞路四川北路一带度过了孩童时代,那

时,旧日的建筑悉数存在,从长辈的口中朦胧地获知了一些昔日日本人的故事,但基本上没有感觉。直到日后阅读尘封的历史文献,自己孩童时代的记忆才鲜明地复活了过来。十来年前我又迁居至虹口,命运决定了我与这一主题的分。

以下,对本书作几点说明。

1. 本书主要依据文献、主要是日文文献,对近代日本文化人与上海及中国的关系进行了论述。除了绪论外,我主要选取了七名日本文化人(第五章包含了若干群体)作为个案考察对象。考察的重点是:这些日本人因何机缘来到上海;他们是如何体验上海的;他们是如何认识上海的;他们是如何表现上海的。当然,这里的上海,其实在相当的程度上涵盖着整个中国,因此,本书同时也非常关注如下两个方面:这些文化人通过上海对整个中国的认识,他们的上海体验在近代中日关系史上的意义。

2. 在近代,芥川龙之介、谷崎润一郎、横光利一三位是与上海关系密切的重要作家,不过这一方面已有诸多前人的研究,我恐有重复的赘述,暂不列入。在本书的写作计划中,原先还有内山完造和出版了小说集《上海夜话》的井东宪,但一来本书的篇幅已颇庞大,二来原先的交稿期一拖再拖,若将两人列入,在时间上至少还需要半年,鉴于上述原因,本书只能暂时割舍,留待日后再作个案研究。本书选取的七名文化人,大部分在国内尚未展开充分的研究,尤其是他们与上海的关系。希望本书的出版,能够引起读书界对他们的充分关注。除了绪论中论及的内容之外,本书设定的年代是1923年至1946年,起始年是村松梢风初次来到上海的那一年,结束年是堀田善卫离开上海的那一年,因此,书的题目虽曰近代,实际的重点是在大正末年和昭和前期。

3. 本书选取的七名文化人中,除了尾崎秀实是媒体人和评论家、名取洋之助是摄影家和出版人外,其他都是文学家,因此所考察和分析的对象,大部分是文学作品。但是本书完全没有文学研究的意图。之所以选

取了不少文学家,是我认为他们在客观上扮演了一定程度上的舆论领袖的角色,他们的许多相关文字,大多发表在日本最有影响的报纸杂志上或以单行本的形式出版,他们对于上海乃至中国的认知,与同时代日本人有关上海和中国的认识与舆论是互为因果的关系,或者说他们在一定程度上左右了同时代乃至下一代日本人的相关认识,因而具有典型的意义。这些文学作品,在笔者的眼中,只是历史文本,笔者试图通过这些文本,来寻找出其思想史上的意义。

4. 本书所引述的日文文献,除极少数原文为汉文(书中均有注明)外,均由笔者直接译自日文原文,译文若有错讹,理应由笔者负责。另,明治时期的文献,大多留有日语“文语”的痕迹,除原文为明显的口语文外,一般用浅近的文言译出,明治以后的文献,原则上用语文体译出。为便于读者查对原文,注释中的日语文献名均用原文表示。

5. 作为偏重于历史的研究,我深知所使用的文献应该尽可能是最初刊行者,无奈我身在中国,搜寻不易,除了绪论中的大部分和村松梢风、佐藤俊子等部分使用的是最初刊行的文献外,其他部分较多地使用了他们的全集。好在日本人编辑全集甚为谨慎,除了将汉字词语改为现行的汉字外,一般不会作任何增删,大部分版本连假名都完全遵照战前的样式。只是所谓的全集,却并不完全,还有相当的文字并未收录其中,笔者尽管已努力搜寻,却也难免挂一漏万,这是今后需要改进的。

6. 本书出现的日本人名,一般后面标注生卒年,欧美人姓名,后面标注西文原名,中国人名,除少数比较冷僻者外,一般不标注生卒年。另,日文文献的出版年,本书均将明治、大正、昭和某某年换算成了公元纪年,以便于中国读者理解。

7. 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在文献的搜寻、复印、借阅等方面得到了许多师长的热情帮助,他们是京都大学的山室信一教授、大阪学院短期大学的竹松良明教授、东华大学的陈祖恩教授,以及曾在日本或现在仍在日本

的李振声兄、许金生兄、艾菁、宋佳、尹月等，还有小女晓纯。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还自始至终得到了家人以及赵蔚华编辑的热情鼓励和支持，赵蔚华编辑为本书的编辑出版付出了很大的辛劳。没有上述友人、家人和编辑的援手，本书无法完成，至少不是如今的面貌。在此谨向各位表示衷心的感谢。另外，本书获得了日本国际交流基金的出版资助，在此予以特别感谢。

徐静波

2013年10月9日于复旦大学面向燕园的研究室

目 录

前记	1
第一章 绪论：近代日本人对上海的认识与研究(1862—1925)	1
第一节 序言	1
第二节 幕末日本人对上海的认识(1862—1867)	
——以“千岁丸”的上海之行与岸田吟香的 《吴淞日记》为例	3
第三节 明治时期日本人对上海的体验与认识(1868—1911)	19
第四节 大正时期日本人对上海的认识与研究(1912—1925)	28
第二章 村松梢风：“魔都”意象的制造者	44
第一节 从上海开始的中国因缘	44
第二节 在上海与中国新文学家和政治活动家的交往	53
第三节 “魔都”意象与长篇小说《上海》	71
第四节 “一·二八事变”与村松梢风的日本人立场	85
第三章 金子光晴：一个诗人的上海和中国体验	104
第一节 与中国相关的履历和在上海的游历	104
第二节 上海意象和江南履痕	125
第三节 一个非主流诗人的反战声音	137
第四章 尾崎秀实：在上海从政治信仰走向政治实践	150
第一节 上海因缘的序曲	150

第二节	上海岁月:尾崎秀实人生的实际转折点	157
第三节	后上海时代:中国问题的研究家、共产国际谍报活动的殉难者	182
第五章	名取洋之助的太平出版公司:特殊年代日中文人的聚合场	205
第一节	名取洋之助与中国的复杂因缘	205
第二节	太平出版印刷公司与周边的文化人	211
第三节	太平书局的设立和出版物及与此相关的中国文人	244
第四节	在中国的最后岁月	260
第六章	阿部知二:从北平到上海,从上海到北京	279
第一节	早期的文学活动和思想倾向	279
第二节	从北平到上海	283
第三节	“上海物”中展现的人物和意念	302
第四节	旧·新中国的体验对于阿部知二的思想意义	323
第七章	武田泰淳:“上海的萤火虫”	345
第一节	武田的中国因缘	345
第二节	“上海的萤火虫”	354
第三节	武田的“上海物”和上海意象	359
第四节	武田的中国叙说和中国认识	372
第八章	堀田善卫:从上海感知中国、认识日本	392
第一节	在上海的心路历程	392
第二节	以上海为主要舞台的作品中呈现的中国意象和中国人形象	418
第三节	长篇小说《时间》和评论集《在上海》中的中国与日本	437

第一章

绪论：近代日本人对上海的认识与研究(1862—1925)

第一节 序言

近代日本人对上海的认识从来就是对中国认识的一部分,或者说日本人对上海的认识始终是与对整体中国的认识紧密相关的。但是,由于上海在近代中国的独特的位置和性格,比如它对外开放的早期性和规模性,与西方殖民主义伴随而来的现代性,以移民为主体的都市居民结构的多元性等,都使得上海表现出与中国其他地域不同的鲜明特质。对开国比上海要晚的近代前期的日本人而言,上海既是一个彼此之间睽违了两百多年后直接了解中国的重要窗口,同时也是透过上海实际感受和理解在武力的背景下近代西洋文明进入东方后激起怎样反应的一个现场,或者说近代上海的演变是日本从前近代国家向近代国家转变的一个重要的参照系,而在中日甲午战争之后,上海则成了日本向中国扩张的直接前沿。从这一角度来说,上海对于近代日本而言,具有特殊的意义。

上海在中国本土的重要性,大概始于清政府于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掌控了台湾并于二十四年解除了海禁、在上海设立了江海关之后。但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清政府又在江浙沿海一带设立海禁,上海港随之关闭。1831年英国东印度公司为拓展在远东的市场,派传教士探查中国沿海各港口,由此了解到上海在地理上的优势位置,并于翌年派职员林赛(H. H. Lindsay)率领阿美士德号轮船专程到上海对黄浦江水道等进行详细的测量和调查并汇总成了书面文献呈报公司,于是在1842年签署的《南京条约》中英方所要求的五个开埠港口内,上海的名字赫然列入其中。

翌年,上海正式对外开放,开始了近代化的演进,它在中国以及远东乃至世界上的地位,日益彰显。

日本在 16 世纪中叶以后,随着大航海时代之后西方势力向东方的扩张,已从或由西方传教士直接带来或经由中国传来的西方人编制的世界地图及全球地理的书志中开始逐渐了解到了外部的世界,1695 年西川如见(1648—1724)依据利玛窦(Matteo Ricci)的《坤輿万国全图》和艾儒略(J. Aleni)的《职方外纪》刊行了两卷本的《华夷通商考》,上卷均为有关中华十八省的中国地志,新井白石(1657—1725)完成于 1713 年的《采览异言》中依然有相当的篇幅是对中国地理的描述,但里面都未提及上海。只有在少量的漂流民记中偶尔会有些语焉不详的记述。这一方面是由于上海其时尚未成为一个通商大邑,另一方面也由于自 17 世纪开始的锁国时代,遮蔽了日本人对外界的充分认识。幕末的日本人开始注意到上海,大概主要源于两个因素。一是鸦片战争的消息通过抵达长崎的中国商人所撰写的“唐风说书”传达到了日本,据此出现的由岭田枫江撰写、1849 年刊行的《海外新话》中,提及了与此次战争相关的上海^①;二是 1854 年,尤其是 1859 年日本被迫开国以后,大量欧美的商船开始来到横滨、长崎等开放港口,而这些船只的相当部分是由上海驶来的。此后,幕府意欲模仿西方,以海外贸易来振兴日本^②,同时也借此观察因长期的锁国政策而十分疏隔的实际的外部世界。当时的日本人获知,在上海有与日本签订通商条约的美国等国派驻的商馆,适宜于派遣官方的贸易商船。于是有了文久二年(1862 年)的“千岁丸”上海之行^③。近代日本人与上海的关联也由此正式开启。

对于幕末明治时期的日本人而言,上海首先是中国的上海,人口十余万人的上海县城是一个典型的中国社会,1855 年 2 月签订的《上海华民居住租界条例》标志着租界华洋杂居格局开始形成;同时上海也是世界,尤其是西洋的上海,1845 年、1848 年、1849 年先后出现的英、美(1862 年英、

美租界合并为公共租界)、法租界,代表着一个新的上海,这完全是一个由西洋人开发建设并在司法行政上加以独立管理的存在,虽然日后居民的大多数是中国人,但是处于主导地位的始终是西洋人,这里出现了与此前的中国本土迥然相异的新的样态;再次是与日本紧密相关的上海,1870年代、尤其是19世纪末期以后,出于各种动机和目的,或由官方派遣,或由民间自发,或是两者交杂,各个阶层的日本人陆续来到上海,或短期滞留,或长期居住,在虹口一带形成了日本侨民社会。这样一个多元组合、多重叠加、既相对分离又互相交融、同时其经济政治文化的影响力日益凸显的都市,对于正在走向东亚乃至世界舞台的近代日本而言,无疑是一个巨大的存在。因此,近代日本人对于上海的认识,首先是对于以上海为媒介的中国的认识,其次是对与上海相关的世界的认识,同时也是对于通过上海所体现出来的中日关系的认识。因此,近代上海对于这一时期的日本人,实际上具有三层意义:观察中国的现场;透视世界的窗口;反观日本本身的参照系。

第二节 幕末日本人对上海的认识(1862—1867)——以“千岁丸”的上海之行与岸田吟香的《吴淞日记》为例

1862年“千岁丸”的上海之行,应该是近代日本人首次造访上海。关于这次上海之行,已有诸多研究成果^④,本书不拟详细展开。这次航行的文献记录,主要是随行商人和侍从(多为下级年轻武士)所撰写的航海日志和日记等,多年之后得到陆续刊行,其中有长州藩武士高杉晋作(1839—1867)的《游清五录》(具体为《航海目录》、《上海淹留目录》、《长崎淹留杂录》、《内情探索录》、《外情探索录》,1916年收入《东行先生遗文》刊行);长崎商人松田屋伴吉的《唐国渡海记》(1926年刊行);中牟田之助的《上海行日记》、《自长崎至上海航海日记》、《上海滞在中杂录》(收入《子爵

中牟田之助传》，1919年刊行）；纳富介次郎的《上海杂记》、日比野辉宽的《赘疣录》和《没鼻笔语》（1946年刊行）。虽然每个记录者的视角和经历稍有不同，但获得的见闻有相当的趋同性。以下，本书依据这些文献对“千岁丸”随员的上海认识进行粗略的考察。

在《上海杂记》中有一对上海的沿革和概况的叙述，译录如下：

上海古时位于禹贡扬州之地，属吴。吴灭后划入越，越灭后划入楚。秦时始置郡县，即会稽郡。至元时设松江府，上海隶属该府，至今无改。其地位于海之上方，通往港口之海口处，曰扬子江。此江甚阔大，距左岸之宽度约三十町（日本长度，共约3270米——译者注），右侧则望无际涯。唯可见三两洲渚而已。但水浅，能行船舰处宽不过一里（日本里，1里约相当于4公里，下同——译者注）半而已，且水色浑浊呈泥浆色。沿此江前行十里许，左侧为吴淞江（疑为黄浦江之误——译者注），沿此前行六里许即至上海沪渎城。上海面向黄浦江。^⑤

此段叙述还提到了《上海县志》，显然这是参考了中国文献记载并经作者实地考察而写出的文字，虽然还有些舛误，却是至此日本文献中对上海历史与地理的最初的完整描述。

高杉晋作的《航海日记》五月六日（旧历）条中记述了初入上海港时的感觉：

“朝早，川蒸汽船来，引本船，左折溯江，两岸民家风景殆与我邦无异……午前渐到上海港，此中国第一繁津港，欧罗波诸邦商船军舰数千艘停泊，槁花林森，欲埋津口。陆上则诸邦商馆粉壁千尺，殆如城阁，其广大严烈，不可以笔纸尽也……黄昏归本船甲板上，极目四

方，舟子欸乃之声与军舰发炮之音相应，其景如东武火花之景，实一愉快之地也。入夜，两岸灯影泳水波，光景如画。（原文为汉文）^⑥

1862年时，沿黄浦江一代的租界也只是雏形初具，但沿江一带的楼房和江面上桅樯林立千帆竞发的繁盛气象，还是令开国不久的日本人惊讶不已。但这只是当时上海的一面，或者说是西洋人上海的一面。上海县城或是中国人集聚区的景象，也同样令日本人感到震惊：“上海市坊通路之污秽难以言说。小衢间径尤甚，尘粪堆积，无处插足，亦无人清扫。或曰，出市街即为旷野，荒草没路，唯棺槨纵横，或将死尸以草席包裹，四处乱扔。炎暑之时，臭气熏鼻。清国之乱象，由此可知。”^⑦

“上海中，粪芥满路，泥土埋足，臭气冲鼻，其污秽难以言状。”^⑧

“每街门悬街名，酒店茶肆，与我邦大同小异，唯恐臭气之甚而已。”（原文为汉文）^⑨

“徘徊街市，土人尾予辈来，土人臭气蒸人。”（原文为汉文）^⑩

上海旧城，街巷狭隘污秽，大概原本就有，但如此难以忍受的状态，应该与太平军的进攻破坏以及苏浙一带的难民大量涌入有关。而这一乱象，恰被“千岁丸”一行的日本人所目击，见诸笔端，不免有些骇人。加之本地中国人吸食鸦片现象的蔓延，使得幕末的日本人通过上海现场所获得的中国印象，相当负面。

另一令这些日本人感到惊愕和悲哀的现象，是洋人在上海的飞扬跋扈和中国人的退让低下：

“中国人尽为外国人之使役。英法之人步行街市，清人皆避旁让道。实上海之地虽属中国，谓英法属地，又可也。”（原文为汉文）^⑪

“去此到孔圣庙，庙堂有二，期间空地种草木，结宏颇备，然贼变以来英人居之，变为阵营，庙堂中兵卒枕銃炮卧，观之实不堪慨感也。英人为中国防贼，故中国迁圣孔子像他处，使英人居此云。”(原文为汉文)^⑫

在上海逗留的两个月期间，“千岁丸”一行考察了英法和中国的兵营和武器，结论是：

“中国兵术不能及西洋銃队之坚强可知也。”(原文为汉文)^⑬

经过近两个月的察访，高杉晋作在《外情探索录》的“上海总论”里，归纳了自己对上海的认识：

“上海位于中国南部海隅僻地，为英夷所掠夺，津港虽繁盛，皆因缘于众多之外国人商馆，城外城里亦多外国人商馆，由此繁盛。观中国人之居所，多贫象，其肮脏不洁难以言状，或一年之中皆居船中，唯富有者在外国人商馆内谋事并居住其中。”^⑭

这段文字差不多也是“千岁丸”一行的日本人对上海的通识。

此后的1864年3月至5月(元治元年二月至四月)，幕府又派遣官府商船“健顺丸”航行上海，目的依然是贸易和实地调查。这次航行留下的记录仅有一份幕吏的上海视察复命书《黄浦志》^⑮，从文献的种类以及文字的量而言，远逊于“千岁丸”之行，但依然留下了有关上海的珍贵记述：

二月二十九日(旧历，下同)，(部分人)下榻于旅亭(原注：即阿斯托尔宾馆。引者注：英文名为 Astor House Hotel，中译礼查饭店，现

名浦江饭店),此上海第一旅亭。其西有新大桥(引者注:现今外白渡桥),乃西人所设,须投钱十五文方可过桥……三月朔日,有旅亭小童,约五六岁,导引我等至街头,途中若遇中国人,小童斥骂,皆纷纷避走。中国人竟如此恐惧西人……三日,至道台馆舍,馆设在城内,抵达后应宝寺(原注:即道台)亲自出迎,引入客室,对话间小吏站立左右,喋喋杂谈,似不知礼……九日,城内散步,城内街道狭窄,难容两人并行。人家重密,苍生数百,杂沓蹂躏……廿一日,在中国人街散步,道路观者如云,道路英国番兵以鞭笞驱散,已而又云集,犹如蚊蚋之趋于残肴……四月一日,观中国剧场(原注:剧场名回美国),与我国歌舞戏略同。场中点五色灯火,客座又点红蜡烛,或五人,或十人,登场,或悲,或骂,或哭,或怒,其形状实令人绝倒,然其衣裳器物颇美丽。^⑩

在日记体的《黄浦志》之后,还附有一“见闻书”,对上海有简略的概述。现译述其大要如下:

上海江(应为黄浦江——引者)与洋子江(应写作扬子江)源流相异,在吴淞^⑪合流。吴淞有法国人阵营及炮台。上海乃外国船辐辏之地,多外国居留人,当今停泊的外国大船百余艘,常滞留于此,六七年前不过五六十艘左右,年年船数大增。上海港于西历一八五零年左右外国人开始来此居住,一八五二年开始渐趋隆盛。奉行(幕府的官名——引者)称道台,管辖一州一府,居住于上海城中,此上为抚台,州府十个为一省,由总督管治。上海城有外濠,积瓦垒土筑成城郭,八方有门可通行,城郭内广约四五町(1町约100公亩——引者),内有繁盛街市,有法国军营,常驻兵卒,道路皆狭隘。城外中国商店亦鳞次栉比,其中大商有十四五家。房屋皆为两层,楼下为商店,楼上居住。其中三层楼房亦有七八家,此为妓楼茶店料理店。^⑫

此外还有较为详尽的有关通货、物产、关税等的介绍,这些有关上海的记叙虽有少许舛误,但较之“千岁丸”一行的记述,有较大的补足,在某些领域也更为详尽,对上海的认识,似也更加全面。

以后在幕府时代,还有 1865 年 4—5 月的“北京号”(英国邮船)和 1867 年 2—3 月的“恒河号”(英国轮船)的两次上海之行,但人员规模要小得多,只是派使者搭船来上海购买船只武器,之后似乎没有留下什么重要的文献,至少笔者迄今尚未发现,也不详一行对于上海的认识如何。

在整个幕末至明治年间,与上海关系最为长久而深远的,当推岸田吟香(1833—1905)^①,初次至上海时他留下的一部手稿《吴淞日记》^②是研究早期日本人与上海的最重要的文献之一,也许是因为尘封多年,也许是解读有些不易,此文献不仅在中国几乎无人提及,即便在日本,也未见有深入研究。这里以此为基本文献,对吟香早期的上海体验和中国认识进行梳理和解读。

吟香出生于冈山县美作国的乡村,原名辰大郎,自幼头脑聪颖,胸怀抱负,据其年谱记载^③,4 岁可背诵唐诗选,5 岁跟从家乡宝寿寺的住持习字,14 岁出外学习汉学和剑道,并在善应寺内开设私塾,授人四书五经和日本外史等,19 岁前往当时的政治中心江户,代人至水户和秋田藩邸授课。吟香知学问无止境,25 岁时又至当时日本最高的学府昌平黉继续深造。曾尝试过多种事业,屡屡失败,1861 年时至江户深川临时建造的青楼当掌柜,对外名曰“银次”,不久成了老板,朋辈皆称其为“吟公”,他便索性改名为“吟香”(“吟公”与“吟香”在日语中发音相同)^④。1863 年,因患眼疾而结识居住在横滨的美国传教士、医学出身的平文^⑤(J. C. Hepbern),同时跟从曾在美国待过的贸易商人浜田彦藏(洗礼后改称 Joseph Heco)学习英文。1864 年 5 月,吟香与浜田一起创办了日本最早的民间报纸《新闻纸》,吟香此后的人生,有相当一部分与报业相关。

其时平文正在编撰一本英和词典,他见吟香为人能干,又粗通英文,